

湖北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胡宗铎陶钧的崛起与垮台.....	卢蔚乾 (1)
从桂唐战争到蒋桂战争.....	蓝腾蛟 (29)
第十八十九两军组建及清乡经过.....	严 敬 (44)
我任胡宗铎参谋长的一段回忆.....	黄素符 (48)
张知本是怎样当上湖北省主席的.....	彭伯勋 (52)
胡宗铎陶钧屠杀人民点滴纪实.....	贺有年 (55)
记新桂系在湖北二三事.....	许士奇 (58)
武汉政治分会扣留程潜的前前后后.....	文心珏 (61)
向警予“引渡”案始末.....	于焯威 (67)
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	龚时英 (76)
蒋介石吞并胡陶残余点滴.....	刘 磊 (82)
白崇禧未能实现的两个计划.....	郑南宣 (86)
忆第五战区长官部.....	张寿龄 (90)
蒋桂在五战区政工方面的明争暗斗.....	袁雁沙 (98)
新桂系在鄂北与陈诚的矛盾片断.....	黄宗儒 (112)
李宗仁与“杂牌”.....	庞盛文 (118)
李宗仁与张自忠.....	吴彦文 (124)
忆组训鄂北“黄学会”协助抗战的经过.....	凌压西 (128)
鄂东见闻纪略.....	易玉山 (132)
鄂东游击纵队成立及改编为保安团队经过.....	刘达九 (154)

新桂系在鄂东前线反共活动点滴……………凌压西(167)

我所知道的程树芬……………瞿汉超(170)

白崇禧围攻大别山战役概述……………戈 鸣(178)

国防部九江指挥所

指挥进攻大别山各战役……………邹 彬 刘汇潮 熊介生(204)

我所经历的鄂东围剿和武汉溃退……………刘月鉴(214)

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及其彻底失败经过……………万式炯(223)

华中“剿总”及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见闻……………叶 敏(237)

我与华中政务委员会……………高鸿彝(243)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与程潜的矛盾……………康 朴(246)

· 质疑· 订正· 补充 ·

对姚雪垠《我在五战区的一段经历》

一文的质疑……………彭 涛(250)

胡宗铎、陶钧的崛起与垮台

卢蔚乾

一、胡陶的崛起

胡宗铎是湖北黄梅县人，陶钧是湖北浠水县人，皆农家子弟，并非出身地主富豪。在辛亥革命以前，胡家因离九江较近，在九江住过一个教会学校，陶曾在蕲水（浠水）县高等小学和黄州府中学就读，辛亥革命时，他们都到武昌投入学生军，后改编为陆军预备中学，毕业后，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此两人同学之所由来。保定军校毕业后，分发到部队里当见习，在北洋军阀时期，重行伍出身而排斥学生出身，总疑学生是革命党，又忌学生的文化比他们高，所以在当时保定军校出身的学生们多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胡陶自不能例外。我记得陶钧落魄时，曾回乡种田割谷、挑大粪，胡宗铎在九江当警察站岗，后来他们得知的保定同学黄绍竑做了广西省军务会办，办了一所军官学校，极力延揽保定同学，王啸风做该校教务主任，极力援引保定同学当教官，因为王啸风是黄冈人，而在浠水住家，所以对于鄂东人拉拢得最多，惟以浠水人尤甚。陶钧、李石樵、江声、汪以南、皮伯韬、徐勉知（大革命时在德安战役中亡故）等皆是。胡宗铎最初在广西新桂系军中当一名上尉连长，作战勇猛，曾受过伤。陶钧原是胡的部属，1926年大革命时，李宗仁充第7军军长，统率夏威、胡宗铎、钟祖培三师北伐，会师武汉，陶钧当时系胡宗铎

的团长，颇立战功，攻克九江、德安后，升为旅长。后来克复南京，李宗仁升为第三路总指挥，胡宗铎升为第三路第3纵队指挥官，指挥7军第2师、15军第2师以及两个独立团，一个工兵营，约共一军人之兵力，由京汉线北伐打张宗昌，迭克蚌埠、徐州。陶钧升为第7军第2师师长，即胡宗铎由广西出发时所带领之一师，胡宗铎回师南京后，升为第19军军长。龙潭之役，击溃东南大军阎孙传芳时，19军卓著战功，陶师牺牲甚大。陶自广西出发以来，战无不胜，胡对之信任颇甚，言听计从，因此，陶益骄傲自满，俨然成了19军的王牌师长。我当时任19军政治部主任，有一天，我同胡陶一路出19军军部大门时，陶对门卫军容不整，加以训斥，胡并无一言。我因走在后面，听到门卫官兵们问是谁在讲话，有人答：“是陶师长”。那个人又说：“他能管到我们军部吗？”可见陶当时越权跋扈，引起官兵们的不满，而其勇于负责，任劳任怨，取得胡宗铎的信任，亦正在此。

二、统治湖北

(一)进驻武汉

1927年秋，经过龙潭战役后，当时蒋介石已下野，另组特别委员会，权负南京中央的责任。而实际上南京由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主政，胡宗铎为19军军长，以陶钧为第1师师长，张义纯为第2师师长（在初则是袁济安的师长）严敬为第3师师长。此时桂系势力很大，白崇禧倡保定同学大团结之议，企图在武汉逼走汪精卫，在南京逼走蒋介石，以便产生一个保定系的领袖。李宗仁想以武汉作为地盘，胡宗铎、陶钧等将领均属湖北人，更早已想打回湖北，企图掌握地方政权，个个跃跃欲试。此时汪精卫、唐生智在武汉方面已与中共分裂，由联共一变而反共，汪精卫并已离开武汉了。唐生智的实力已奄有两湖和安徽三省地盘，其35军何健部进驻安庆，36军刘兴部进驻芜湖，并以何健为安徽省主

席，大有问鼎中原之势。南京政府遂派第三路总指挥李宗仁西征武汉，仍以“讨赤”为名，其实武汉政府亦已反共了。李宗仁统率夏威、胡宗铎、陈调元三军由南京誓师，首先进攻安徽，赶走何键后，由陈调元作安徽主席。我当时任19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出发，军长胡宗铎嘱咐由政治部发布传单标语。扬言北伐，意声东击西，迅速解决何键部队。10月10日在南京小营全军集合出发，由下关渡江，当日宿营浦口，次日宿营江浦，第3日在汤泉镇，胡宗铎始集合全军官兵讲话，誓师西征武汉。其时陶钧尚属胡部第一师师长，我看到他集合军队训话时，对于其他师的官兵，一样毫不客气地予以教训，固不仅对于本师部队检阅很严而已。我当时向他说：“你是个师长，他们也是一个师长，你当着其他师长之面来斥责他的官兵，恐怕越权，人家不愿意，似应注意。”他答以：“我认为19军是一个整体，不管那一师的官兵，纪律不好，都是19军的耻辱，所以我不能不管”等语。何键部队，闻风西窜，西征军追赶不及，仅在安徽西部的盛家驿，湖北东部的大坡、小坡、兰溪、浠水县城附近略有战斗，不很激烈。行军月余，于11月间抵达武汉。我记得19军到达谌家矶时，天已晚，遂在该处宿营。我感觉汉口灯火在望，急于夜进入汉口，遂商于胡宗铎，胡嘱我当晚先到汉口与孔庚接洽。我乃单骑进入汉口，首先在中央银行与孔庚、李书诚、南夔（中央银行汉口分行行长）等3人见面。孔庚向我说：“这些年来我们把地方搞得很不好，对不起湖北的父老们，但是我们在唐生智压力之下，一筹莫展，无能为力。现在西征军来了，我很欢迎，湖北原来的党政负责人年轻的都离开了，仅仅我同李先生（指书诚）年纪较大点，留在武汉静候交待，我们两人未始不知道一走了事，但恐青黄不接之际，地方无人负责，秩序扰乱，那我们就更对不起湖北父老了。西征军来，要杀我们，也是罪有应得。”我答道：“您老何以这样说呢？湖北的老前辈不多，以后还需要群策群力，团

结起来，共同建设地方。”他笑道：“是呀！我想西征军中我有很多好朋友，断不至于把我怎样。”他又说：“我现在请你转告李总指挥和胡军长，今日省府会议决定我做国民日报的总经理，我交代后专门办报，希望维持！”我笑答：“这件事我可以答应你，因为报刊与政治部宣传工作有关，将来可能由我接收的。”他又问：“你们西征军对于党部政府的组织打算怎样办？”我答：“这一个月来都在路上行军作战，只谈作战计划，尚未谈到党政问题。”当时李书诚只含笑而不多发言。孔李两人均是当时湖北省政府常务委员。共同执行主席的职权，而不采用主席制，孔并兼民政厅长，李兼建设厅长。我认为他们表示的态度很好，话毕告别而出。次日西征军进入武汉，我将与孔庚谈话情形转告胡宗铎、陶钧等，都很满意。不料过了几天，第四路总指挥程潜到了武汉，孔庚、李书诚与程潜都是日本士官同学，国民党的老同志，素来关系不错，看到桂系对于党政组织尚无办法，遂想控制湖北政权，程潜想取唐生智而代之，以便不费力而据有两湖的地盘。当时汉口市党部对于程潜开了一个欢迎会，程潜发表演说，此次西征，系讨伐唐生智个人，至于湖北的党部和政府，都是受中央命令所组织的，仍应照常供职。南京政府并发表程潜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原教育厅长李汉俊、财政厅长詹大悲等人，已由李博仁代向日本一只煤油船交涉好了，准备潜逃日本，因为程潜有此说法，遂回到日租界居住开会，计划复职。桂系将领们闻之大愤，以胡陶为尤甚。陶钧说：“我又不是哪个的兒子，我们打出天下由他们坐吗？还是推胡军长做湖北省主席，着手组织省政府。”程潜后来被桂系软禁于汉口，实源于此。我当时因患伤寒病甚剧，不能起来办公，病中听说孔庚、李书诚被捕，詹大悲、李汉俊被枪决，这是当时四个厅长的下场。心中很难过，事后并听说程潜当时曾打电话给胡宗铎，保释詹大悲、李汉俊等，胡答道：“我已经枪决了嘛！”实则当时尚未枪决，是胡命令赶快执行的，并未经过审讯。对于孔庚、

李书诚因其年老资高，胡陶还想利用，便软禁在武汉卫戍司令部（当时胡宗铎兼卫戍司令）。有一天，我阅报载：胡宗铎电向南京中央保荐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将所有湖北党务亦应交由张先生主持等语。我见之大骇，认为一个军长那有这样大的职权呢？这未免失态，遂往见胡宗铎，张知本已先我而去了，他正在说：“我那里能负得起这大的责任呵！”我窥测胡宗铎的用意，保荐张知本是利用他做挡箭牌，实则自己想做主席，这就是说要解决湖北问题，中央首先须问问我姓胡的才行。至若党务要想由张知本主持，这还是一点真心话。张知本当时也没有想到做主席，顶多不过想当民政厅长或高等法院院长而已。后来果然弄假成真，竟当了湖北主席。胡宗铎为什么不保荐他人而保荐张知本呢？这里我起了一点作用。1927年夏间，胡宗铎当第3路第3纵队指挥官时，曾有意打回湖北，他在蚌埠与我讨论湖北国民党的老人中有哪些人可以合作，当时我提出居正、孔庚、蒋作宾、张知本、石瑛等人比较，我说，孔庚一向是革命的，现在虽然站在武汉方面，将来还可以把他拉过来合作；蒋作宾是个官僚，说不上革命；居正是中山先生的助手，革命资格是很老的，但是微嫌学识不足；石瑛为人正派，是个技术人才，但是脾气太坏，好骂人，难与共事；张知本革命历史很久，辛亥革命时就做过湖北军政府司法部长，过去几年在湖北当法政大学校长，那时我当湖北财政专门学校校长，我感到他学识优良，性情平和，是可与共事的。胡宗铎原与张知本不相识，颇以我的意见为然，回到南京后，遂聘张知本为19军顾问，从此胡张两人发生联系，暗伏后来电保张做湖北省主席的根源。况且张知本在两湖临时政务委员会担任过民政处长，保作主席，亦属因利乘便。

陶钧从广西出发时，不过胡宗铎部下的一个团长，作战很勇敢，但在政治上无足轻重。自从西征进驻武汉以后，升为19军副军长，仍兼第1师师长，他就副军长之日说道：“军队应该服从

长官，不能说谁在学校里分数考得好多些，就不听话。”他这样说是怕保定的同学不服。不久又将程汝怀的一个师和刘佐龙的其他残余部队改编为第18军，陶钧升为军长。陶在报上发表文章，从此大露头角，不仅在19军内部树立威信，并且对外亦表现了他的权威。程汝怀被拉了师长实权，而升为虚的19军副军长，是明升暗降。从此对于陶钧，很感怨恨，此亦胡陶集团内部之裂痕。

桂系李宗仁进驻武汉后，唐生智虽然下野了，其所部实力尚残留何键、周斓、李品仙、叶琪等几军人在湖南，不得不谋进一步的解决。于1928年元月间，由李宗仁命令胡宗铎、夏威、叶开鑫三军继续进攻湖南，叶开鑫原为湘军，与李宗仁无深密关系，系临时结合的，中途倒了李宗仁的戈，被夏威部将他解决了。此时陶钧率领18军留守武汉，代理武汉卫戍司令，夏历除夕，亲自率队巡逻，我因病不能随军出发，因留在汉口养病达三个月之久。第7军和19军入湘后，湘军避战，总是兜圈子，战事很难解决。后来他们双方将领因都是保定同学、加以李品仙、叶琪又是广西同乡，接洽结果，罢战言和，白崇禧亲自到了衡阳，召开了长沙会议，决定将李品仙、叶琪两军部队由他率领继续由平汉路线北伐，何键做湖南清乡督办，仍兼35军军长，鲁涤平做湖南省政府主席，胡宗铎做湖北清乡督办，陶钧为会办，只改编了周斓的一个部队而已。

（二）胡陶统治下的军事

湖南问题解决后，南京方面蒋介石亦从日本来复职，充当海陆空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28年春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武汉政治分会主席。当时桂系势力日益发展，形成三大据点，白崇禧驻北平、董绍珩守广西、李宗仁驻武汉，居中控制，而以胡宗铎、陶钧、夏威为核心。其实力操于胡陶之手。桂军夏威部反成为客体。胡当19军军长，陶当18军军长，胡当卫戍司令、陶代理卫戍司令，并负实际责任。胡当清乡督办，陶当会办，胡当省府委员，陶也当省府委员，胡当省党部委员兼组织

部长，陶当汉口市党部常务委员。胡陶夏三个军长都住在汉口旧俄国领事馆内，随时交换意见，可以说是三位一体。夏威为人较宽厚，也不同胡陶争权；李宗仁虽然是个总司令，但是很信任胡陶，依靠胡陶，所以在当时党政军各方面，都是听任胡陶为所欲为，李并不加以限制。所以从1928年春间到1929年春间这一年的期间，可以说是胡陶完全统治湖北时期。他们以军领导政，以政领导党。

自从胡宗铎占驻武汉后，胡首先控制武汉卫戍权力，充当武汉卫戍司令，以接替前卫戍司令贺国光，而将魏益三军队改编为卫戍部队，以师长徐方调充18军参谋长。旋又将15军在武汉的残余部队和程汝怀部改编为18军，以陶钧调升军长，并以程汝怀调升19军副军长，又将19军参谋长李石樵调充第18军第3师师长，第19军第1师参谋长林逸圣调为18军第1师师长，嗣后改编马文德军为师，以张义纯为师长，刘和鼎副之，因张刘系姑表兄弟，同为安徽合肥人之故，并以刘和鼎兼鄂西清乡司令，驻宜昌。又改编李纪才军为师，兼充鄂北清乡司令，常驻襄阳。李是湖北均县人，所带为陕军。另外扩充了武汉警备旅、警备团和保安大队，并办有随营军官学校，以董南为校长（后该校由蒋介石改为中央军校第7分校）。当时武汉方面桂系全部军力，据陶钧说，约在60团之谱，而实际能调赴前线作战的部队则为数较少一点。胡陶们当时骄傲自满，常常骂蒋介石嫡系将领如刘峙、顾祝同之流为饭桶，不能打仗；并说：“我们一团人要打他们一师，我们一师人要打他们一军。我们从广西出发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的……。”我笑道：“你们自视比项羽何如呢？项羽72战，战无不利，而乌江一败涂地。其所以失败的原因，是刘邦能用三杰，懂政治，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又不懂政治，专凭武力。所以你们不能专讲打，还是要注重政治。马上能得天下，马上不能治天下，应当三复斯言。”我不管他们喜听不喜听，总想引导他们注重政治而不要专尚武力。他们表面上虽然表示接受我的意见，实际上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当时桂系极力扩军备战，凡在湖北境内，无论杂牌、土匪都被他们解决了。他们还屡次向蒋介石建议会剿鄂赣边区的红军，蒋介石恐怕桂系军事势力插入江西，没有同意。陶钧曾以清乡会办名义率军队到鄂北剿匪，陶钧残忍好杀，听说他在剿匪时期，捕获大批土匪，其间当然不全是土匪，也有善良人，纷纷为自己辩解，他的处理办法，是叫他们排队，他用手在中间一划，前半段的一律枪决，后半段的一律释放。草菅人命，一至于此！

（三）胡陶统治下的政治

桂系西征武汉胜利后，原拟以胡宗铎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但因南京中央发表程潜为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主席，引起了他们的反对，胡宗铎特电保张知本为湖北省主席，是以张知本做个挡箭牌，并非真正保张为主席。经过长沙会议后，两湖问题得到总的解决，遂决定以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胡宗铎清乡任务完毕后，即以胡为省主席。胡在清乡督办任内，等于是湖北的太上皇，实际上控制省政府，张知本不过听命而已。当时湖北省政府的组织，系以严立三为民政厅长，不久辞职，改以孙华甫接充，张难先为财政厅长，石瑛为建设厅长，刘树杞为教育厅长，胡宗铎、陶钧、时功玖、但焘、王恒为委员，萧萱为秘书长。时、但二人，是张知本所推荐的，其他四厅长各有背景。有一次开省务会议，张知本的提案，遭到厅长石瑛等反对，不能通过，委员但焘是张的助手，为张帮腔说：“这是主席的命令，应该服从。”石瑛气愤地说：“什么主席的命令！”言毕拂袖而去。其他厅长相继而散，会议遂无结果。嗣后胡陶特约主席和厅长委员们聚餐，从中调停了事。可见当时省政府内部不和，主席不能维持秩序，还得由胡陶转圜。此即以军统政之一端。

（四）财政方面

又有一次汉口市财政局主办营业税，集中营业税收，可以增加收入。虽于大商人不利，但减轻了中小商人的负担。惹起商会

会长周星棠等的反对，并且乘省务会议的时候，集合几千商人请愿。因汉口为普通市，应属省政府管辖，所以向省府请愿。主席和主管厅长都不肯接见商人，还是推胡宗铎、陶钧出来接见。胡宗铎说：“历来的政府如北洋政府，汪精卫政府没有不找你们商会要钱的，你们都不敢反对，我们并没有要过你们分文。现在汉口实行营业税，废除苛捐杂捐，是一种很好的税法，你们为什么要反对呢？混蛋！王八蛋！”陶钧继续发气说：“滚蛋！你们以为我不会杀你们吗？”“即令卫队把机关枪拉出来，吓得请愿的商人们抱头就逃。结果营业税还是办通了，不过推迟三个月才施行。所以当时有“三蛋将军”、“三蛋营业税”的说法。当时商会提条件，举办营业税要由商会派人参加，以防收税的人贪污，有一种监督之意。胡宗铎说：“这种税收还没有实行，你们为什么知道有贪污呢？如果有贪污，我们自然是要办他们的，用不着你们派人来参加。”嗣后汉口市财政局约集商人开会时，由局长于垞咸当场声明说：“如果我有贪污的行为，听凭你们当街枪杀我，决不要你们收尸”等语。商人乃当场表示拥护营业税的推行。此事有大资产阶级剥削小资产阶级的意义，因为汉口大商人周星棠一向把捐税铺派到中小商人负担，而大商人反而从中渔利，所以他们的条件要派人参加营业税收机关，并不是真正怕税收人员贪污，而是为大商人逃税提供方便，让中小商人多负担税额而已。当时，就湖北省整个财政情况而言。还是比较有成绩的，其所以如此，财政厅长张难先本人比较廉洁，又能用税务科长夏赋初，整顿厘金税收，带来商业繁荣，税收增加。在北洋军阀时代，各个厘金局长，都有强有力的后台老板，局长不过是个扛牌子的。税收多为后台老板所得，局长不过从中分一部分利润。对于财政厅下达的指标额，就是达不到也无关系，财政厅长也很难更换厘金局长。胡陶对税局用人，不加干涉，其他将领更不敢滥荐一人，较之过去稍胜一筹。

当时湖北财政，除由省财政厅主管之外，还有截留中央的税收如烟、酒、印花税之类，另由武汉政治分会组织一个湖北财政委员会管理，以广西人白志鹏为主任委员，桂系第7军粮源仰给如此，胡陶不许桂军挪用湖北税款，所以第7军在武汉不能扩充军队。第19军自从由第7军分开独立成军后，扩充的兵力，将达五军之众，因为还控制一笔清乡经费，清乡属于省政，可以动用省款。还有一笔大税收，就是鸦片税，美其名曰“特税”，特设禁烟总局管理之。桂军将领原想用夏威的哥哥充当局长，而胡陶不同意，结果以陶钧的第18军经理处长叶波澄为局长。这种收入庞大，有人估计约有五百万元之多，这也是胡陶扩充军队的饷源，以后陶钧、叶波澄发了大财，即由于此。从此桂军将领对于胡陶很不满意，后来李明瑞、杨腾辉之临阵倒戈受此影响很大。桂系内部裂痕日深，当时传为“鸦片战争”，可以想见其严重了。

(五) 民 政 方 面

当严立三作民政厅长时，名气很大，又是湖北“三怪”之一，应该有所建树，而事实上无成绩可言，不久孙华甫（绳）继任。孙只知军事，不懂民政，加以本身有鸦片嗜好，精神不振，不能有所作为，仅举几个县为例，即可略知一、二。

钟祥县长张祖书，浠水人，与我少时在县高小同学，他当学生时就与某监学勾结一气，包揽词讼，同学们深鄙其为人，民国初年，他得了蔡甸县佐的空缺，因贪污被地方民众赶走了，连鞋子也跑掉了。孔夷做民政厅长任内，放了钟祥县长，西征军来后，张屡次找我写信给张知本主席，成全他到任，被我拒绝，又找李石樵帮忙。到任以后，勾结地方劣绅王四老爷贪污，遭到反对。适陶钧路过钟祥，随行的有19军副师长江声（楚涛）是浠水人，江声对张祖书说：“你对陶说话要慎重。”及张见陶，陶坐在上面昂然不动，张立在下面，执礼甚恭。陶说：“你是张紫庭吗？”张答：“报告会办，县长名张祖书，会办称我的号，不敢

当。”陶说：“为什么做这个样子？我说你是个怪种，你就是个怪种吗？”张即自批其烦说：“我是个怪种，我真是个怪种，会办还骂轻了。”陶钧大笑起来。陶故意令张搭浮桥三座，限明晨完工，若完成不了以贻误军机罪枪决。说此话时，已经是夜晚，到了次晨，浮桥果然成功。陶钧笑着对江声说：“张祖书这个怪种，还有点用处，很能干。”大半年后，张祖书仍被控撤职。他回省后来找我。我问他：“你在钟祥做得怎么样？”张答：“除了共产党赵鹏飞反对我外，一般人都是拥护我的。”我说：“赵鹏飞是个国民党员，人很正派，那里谈得上是共产党啦。我听说你的县长就是由一个劣绅王四老爷做，安得而不坏事呵！你应该好好地检讨一下。”自此，他与我不见面了。

“松枝宜三县巡阅使”刘起需。当时宜都县有个大劣绅刘起需，干预松滋、枝江、宜都三县的县政，武断乡曲，鱼肉平民，人称“松、枝、宜三县巡阅使”。黔军李燊驻在宜都时，与他驻军勾结，残害人民。后来刘和鼎做鄂西清乡司令驻宜昌，刘起需动辄以“共产党”的罪名残害青年农民和学生，因之被杀被关的不少。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据县党部检举，由清乡督办署命令刘和鼎，将刘起需和他陷害的一干人等押解来省审办。刘起需押解时，沿途设有招待处，连省主席张知本也被他运动了。在清乡督办署军法处由省党部、省政府派员会审，我曾代表省党部往清乡督办署会审，我感到刘起需太可恼，被诬陷的青年学生和农民太可怜，即开释了十余人，训斥了刘起需一顿，我想重办刘起需，仍旧还押候审。但军法处受了运动，张知本也帮刘起需。此案尚未结束，而桂系就失败了。

“种试验田”的黄陂县长萧觉天，湖北清乡，法令繁苛，闭户造车，不合实际，各县多不能按要求办事。有一次清乡督办署总务处长秦果（广西人）率领人员到各县视察，发现黄陂县长能按照法令所规定的办理，考绩第一，予以表扬奖励，其他县长都惊

而讶之，不知黄陂县怎么能做这样多的事？纷纷询问萧觉天。萧把一切经费用于某一个乡，完全照规定办理，其他乡镇就顾不了。其投机取巧，可见一斑。

(六) 建设方面

建设厅长石瑛是个长于科学技术的人，为人正直、廉洁，对建设很想有所建树。于水利很认真，严禁贪污，扫除积弊，与北洋政府时代是大不相同的。湖北滨临江汉、洞庭之间，湖泊港湾罗布，很容易遭受水灾，所以特筹一笔水利经费作为年年补修堤工之用，又设水利局专管其事，不完全属于建设厅，而是双重领导。在石瑛作建设厅长后，将水利局归并建设厅办理，成绩较为显著。

(七) 教育方面

教育厅长入选，最初发表王世杰，王因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局长，未就职，乃荐刘树杞接充。四个厅长中，刘完全是个学者，胡陶不许将教育经费挪作它用，尤其是看重小学教育，所以当时小学教育，比较正规。一个专任小学教员的待遇可以达到80或90元不等，因此教员们安心办教育，成绩较好。

(八) 党务方面

在大革命时代，湖北的党务由国共合作到国共分裂，至胡陶统治时期，则反共达于极点，甚至连国民党的“左派”亦以准共产党目之，所以当时以共产党罪名惨遭杀害的，不计其数。1928年春国民党中央派张知本、胡宗铎、张难先、石瑛、孙铁人、习文德、王绍佑等七人为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组织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省党部的职权，整理全省的党务，从新登记党员，训练党务干部，会中以张难先、石瑛、孙铁人为常务委员，主管秘书处事项，以张知本兼组织部部长，胡宗铎兼训练部部长，习文德兼宣传部部长，王绍佑先不许就职，经过在湖北党务训练所总务处主任考验半年后，才准就委员兼民政训练委员会主

任委员。首先筹办湖北省党务训练所，因为该所由训练部主管，遂由胡宗铎兼所长。后来武汉市党部成立，孙华甫充当训练部长，添副所长一名，以孙充任。所长下设秘书兼教育长一人，以潘宜之充之。其次汪奠基为教务主任，王绍佑为总务主任，张映南为教导主任，汪世鏊为军训大队长，以黄昌谷、习文德、卢蔚乾、彭伯勋等兼充教员。除在武汉招生外，并分派卢蔚乾为黄州区招生委员、习文德为襄阳区招生委员、彭伯勋为宜昌区招生委员，分区招生，约共考取500人，内中有少数年高资深者，3个月至6个月毕业。毕业后分别派赴各县市担任委员，组织县市党部，这就是当时训练的党务骨干份子。后来胡陶失败，“C.C”吸收这些学生做骨干，把持国民党湖北的党务达十余年之久，最著名的为“十人团”，如：袁雍、钱云阶、张导民、陶尧阶、刘鸣皋等皆是。

湖北省党务委员会发刊了“湖北党务指导月刊”，卢蔚乾任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

省党务委员会施行所谓“感化教育”，曾设有感化院，以佛教徒张纯一为院长，张将感化院布置为一座佛堂，我同潘宜之特前往视察，果然发现他在孙中山先生的像片上面悬挂“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横额；更在像片左右悬挂“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对联。我们看见后啼笑皆非，潘宜之要张纯一换上“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那一套照例的文章。

暑假期内特设党义教师训练班，调中小学校的党义教师来受训，以训练部长胡宗铎兼班主任，以推行三民主义的党化教育为目的，限期一个月结业后，以个别谈话为结束。

湖北省党务委员会经过半年以上的整理，党务训练所学生毕业，均派往各县市为委员，组织县市党部。是年冬，湖北省党务委员会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其最大任务有：（1）选举出席国民

党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2）选举湖北省国民党执监委员，成立正式省党部。

当时是蒋介石兼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为秘书，实际上就是陈立夫当家作主，所以当时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话。他们的选举办法是：选举第三届出席代表时，先由省代表大会选举加倍的代表名额，报由中央组织部圈定。初选时，我得票最多，居第一位，而中央偏偏把我圈掉了。迨到选举省执监委员时，又改变了选举办法，由中央先指定加倍的名单，再由省代表大会选举，此次他们又把我的名字搞掉了，所以我没有候选人的资格，无从当选。此事惹得胡宗铎大骂：“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得票居第一位，竟被指定掉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反被指定出来了，未免太开玩笑！”推测原因，由于陈立夫当时极力发展“C.C”，排斥异己所致。

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改组成立正式党部后，仅仅胡宗铎与张知本互换主管单位，即胡宗铎由训练部调组织部，张知本由组织部调训练部，其他无变动。为什么胡张互换呢？因为在党务指导委员会时间，主要是训练党员和干部，正式党部成立后，重点在调整各县市党务组织。我当时就是做训练部秘书，代胡宗铎守摊子。

武汉市行政组织，在胡陶时期，虽属于湖北省政府组织之下，而汉口市党部的组织，当时与湖北省党部对立，直属于中央党部。因此于湖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又由中央派陶钧、李石樵、涂久檀、刘伯英、孙华甫为汉口市党部指导委员。陶钧为常委，涂久檀为组织部长，孙华甫为训练部长，是年冬，改组为汉口市党部。除选举潘宜之、林逸圣、彭伯勋等为执行委员，于宅咸、陈言等为监察委员，并以彭伯勋兼民众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外，无多大变更。